

眾聲喧嘩的迷思 ——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

夏春祥*

《摘要》

作為台灣學術界的一份子，本文是關於人文、社會研究的「反思性」筆記。討論範圍包括了研究者與研究社群，所關懷的則是台灣以及華人的傳播研究。內容始於本刊主題—「傳播學的眾聲喧嘩」，在釐清它所形成的各種迷思之後，研究結論指出真實生活中的各說各話，總讓我們遺忘了應該面對的問題，甚至產生一些似是而非的景象。藉由 M. Bakhtin 的論點，我們瞭解到各自表述並非眾聲喧嘩嚮往的內涵，能在差異的聲音中分辨優劣，繼而型塑出視野開闊、切合台灣社會，以及能使不同意見各安其所的對話與共識，才是傳播研究努力的目標。

關鍵詞：台灣學術界、反思性、研究者與研究社群、傳播研究、眾聲喧嘩、對話

*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E-mail: chhsia@cc.shu.edu.tw

什麼是眾聲喧嘩呢？它是指眾多不同的各自表述所形成的熱鬧景象嗎？如果它是，那我們接著想問，它們各自表述所由來的對象，是同樣的東西嗎？如果不是，那它的真實內涵又意味著什麼？本期的專題名稱是「傳播學的眾聲喧嘩」；名稱與概念本來就是有所指涉而存在，因此它傳達出某些訊息，只是仔細思量之後，卻又發現它也模糊了一些認識。所以，從迷思的釐清出發，我們期待能更清楚地瞭解到傳播研究眾聲喧嘩下的真實面貌。

眾聲喧嘩，作為一個現代社會中的普遍字詞，它最早是和文學密切相關的。在國內文壇，早在1988年，其時任教於台大外文系的王德威便以「眾聲喧嘩」之名，書寫對於三〇年代與八〇年中國小說的評論。他在自序中寫道：

眾聲喧嘩 (heteroglossia) 一詞源出於俄籍批評家巴赫汀 (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1895-1975) 的批評用語，意指我們在使用語言、傳達意義的過程裡，所不可避免的制約、分化、矛盾、修正、創新等現象。這些現象一方面顯現文字符號隨時空而流動嬗變的特性，一方面也標明其與各種社會文化機構往來互動的多重關係。...「眾聲喧嘩」一詞之中譯出於筆者的杜撰，但多少迴響了洛夫先生多年前的詩集名稱《眾荷喧嘩》。... (王德威, 1988:5-6)

大陸留美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劉康，在《對話的喧聲》(1995)中討論 M. M. Bakhtin 的文化理論時也沿用這一字詞，來描述社會語言多樣化的文化特徵。如果這樣的溯源，有助於釐清此時此地關於傳播研究景象的認識。那麼，回到 Bakhtin 的思考脈絡，重新探詢眾聲喧嘩，則是可能努力的工作。

壹、Bakhtin 的眾聲喧嘩

基本上，Bakhtin 所涉獵的範圍極為廣博，從詩歌、小說等文學評論，到宗教、藝術、哲學、社會學、語言學、美學等。而他提出 heteroglossia（眾聲喧嘩）一詞，主要是描述一種文化轉型或變遷之下所被開拓出來的文化體認，這種體認展現了各種對權威的接受、省思與反抗的一連串過程，最終它表現為一種活生生的現實態度，它積極、樂觀、且富建設性地在歷史情境中凸顯了一種對未來開放的未完成性，其特徵為開放、多層次、離心與對話⁽¹⁾。

他在《杜斯妥也夫斯基⁽²⁾詩學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一文中，曾經指出：

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與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所組成真正的多聲調、複調…這確實是杜斯妥也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基本特點。(Bakhtin, 1998c)

這是他最積極讚許的小說表達形式，而與之相對的則是一種傳統單面向的創作思維。在這種思維觀點下，人被物化也被客體化，創作者主導也統涉了一切、人物不過是他創作中沈默無聲的奴隸。這是他稱之為獨白式的話語，在這樣的認識下，就連 Leo Nikolaevich Tolstoy⁽³⁾ 這樣語言豐富多彩的作家都被認為是傳統的、且未體現出對話式話語的價值。而對話的價值，則是他眾聲喧嘩觀念中極為重要的成分。

這樣簡單的回顧，目的並非在精準地把握「眾聲喧嘩」一詞的完整內涵，只是想在我們的模糊認識與概念的意涵指涉之間，凸顯關於這一字詞的更多可能⁽⁴⁾。當傳播學的眾聲喧嘩成為我們傳播研究者的自我想像時，顯然我們接受了一種多樣的指涉，它意指著傳播研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傳統、論點與流派。然而，傳播研究被認可為一門學科了嗎？這些傳播研究中的學術傳統、論點與流派，是否被其他人文、社會研究者所接受呢？換句話說，顯然「傳播學的眾聲喧嘩」隱藏著一些矛盾有待

我們認識。只是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權且先釐清幾個不同層次的脈絡。

貳、傳播學的衆聲喧嘩：釐清的起點

第一是傳播學在人文、社會研究中的地位，第二是台灣的傳播學現狀。基本上，作為學術體系裡的一個學門，它包含了研究與教學兩個環節，因此要釐清現狀，我們有必要瞭解到這些不同環節的力量。

首先，關於傳播學的地位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傳播研究者始終關心，卻也一直為其困擾。從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的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今日的2002年，國際上的各類傳播期刊，始終在爭議傳播是不是一門「學科」？⁽⁵⁾從處處蛙鳴的田野⁽⁶⁾、存在那些典範與研究議題⁽⁷⁾、科學與前科學的爭論⁽⁸⁾、到學門或領域的定位與未來⁽⁹⁾？直至今日，地位如何，始終未定。不過，逐漸有的共識是它研究傳播現象，而這現象也正隨著傳播科技的不斷發展而更形重要。

而地位未定的關鍵在於作為一個學門，它與其他現有學門的差異性不夠明顯。當心理學藉由個體的心靈與行為等具體面向，逐步從哲學真、善、美等價值的抽象討論中畫出自己的領域；當社會學透過 Emile Durkheim 的討論，逐步確立起那種由個人所組成，卻超越個人的集體力量是一種社會事實 (social fact) 時，社會學也從心理學的個體解釋模式中區分出來繼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當任何事物都可以從心理與社會兩個面向解釋時，傳播學在解釋上的確顯得缺乏獨特性，甚至是缺乏社會學與心理學門在解讀現象時所展現出來的深刻性。辨明傳播學在研究體質上的虛弱，則是本文想釐清的迷思之一。

第二個脈絡，則是關於台灣的傳播學現狀。首先是台灣在整個全球發展中，處於邊陲的地位，學術研究也是如此。而這樣的邊陲地位，不僅只是傳播，許多人文、社會研究以致於自然科學，都面臨到相同的位置壓力。因此，台灣其他的人文、社會研究社群甚早便積極尋出路。社會科學研究前輩們楊國樞、文崇一、李亦園等諸位先生，在呼籲學術

研究本土化之前，便會提到這樣的心路歷程。

...我們有意、無意地抑制自己中國式的思想觀念與哲學取向，使其難以表現在研究的歷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評的接受與承襲西方的問題、理論及方法。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趨，以趕上國外的學術潮流為能事。在研究的數量上，我們既無法與西方相比；在研究的性質上，也未能與眾不同。時至今日，在世界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界，只落得是多我們不為多，少我們不為少。（楊國樞、文崇一，1982: II）

這樣的情形，普遍來說是台灣學術界的共同問題。只不過，傳播學界的研究成果不僅和其它社會科學學門一樣有著相同的處境，更面臨一些學科本身所遭遇到的獨特影響力量。西元 2000 年，國內學術研究最仰賴為經費補助來源的國科會，重新將原本列為獨立學門的傳播領域，劃歸入社會學門之下。政大新聞系教授陳百齡在國科會專題計畫與傳播研究的相關探究裡，便提到「領域中人聞之不免感受到挫折的經驗」（陳百齡，2000：8）；而中華傳播學會創會理事長陳世敏，與現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臧國仁在回顧傳播學的成就與評估時，也寫道：

傳播學由於具有濃厚應用性質...傳播學之內的各個次領域分分合合姑且不論，「傳播學究竟是什麼」這樣的根本問題猶疑未決，就可看出傳播學門基礎不穩，連帶使得研究方向搖擺不定，研究品質難以提昇。（陳世敏、臧國仁，1998:3）

學者們（陳世敏，2000：7；陳百齡，2000：8）曾描述這些情形為偏向於技術與應用的報告，學術性較為有限。香港傳播學者蘇鑰機在〈學術邊陲地區的傳播研究發展〉一文中稱台灣社會的傳播學術發展經驗為「行政型」的發展模式，他如此描述：

(台灣經驗)其主要特點是有優良的學術基礎建設,充足研究經費主力從事數量化的資料蒐集及在本土重複及測試外國著名的研究。這種重量不重質的取向...。(蘇鑰機, 1995: 45)

也就是說,研究學術性不足以致於在研究論述的品質上如何深化,已是傳播學門的困擾及應戮力解決的當務之急。

參、靈魂與身體：關於研究的一些隱喻

而當初心理學界在 1990 年代初,曾針對那種在國際學界中「多我們未多少我們未少」的學術窘境,寫道:「台灣心理學界這種缺乏靈魂的情形,激發部分同仁的強烈不安與質疑。」(楊國樞, 1993:8) 如果有人有具體的身體和抽象的靈魂兩大部分,那麼「強烈不安」當指靈魂的感受。若沿用靈魂的譬喻,那麼傳播社群的靈魂應當是非常不安,因為我們面臨的困境是雙層,而非單一。

傳播學者翁秀琪在 1997 年回應台灣「傳播學正當性危機」時,便曾經指出這兩層面的問題,一是和全球其他地區傳播學一樣,要致力於爭取傳播學門的價值,二則是國際傳播社群對於台灣的傳播界做了什麼研究,可以說完全不瞭解(翁秀琪, 1997: 1-2)。只是此後的發展,更加凸顯了台灣傳播社群內部的問題(因為研究的成果,無法普遍為社會知道與接受);也因此,在讓國際傳播社群瞭解我們之前,更得致力於提升台灣傳播學術社群在國內人文、社會研究中的被接受度。

這類自覺也愈來愈多為社群中人所提出。在中華傳播學會 2001 年香港年會關於「新時代新聞學研究」的討論場次中⁽¹⁰⁾, 1990 年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者潘忠黨在評論台灣、大陸年青學子的學術論文時,便指出台灣的學生們,在論文格式的寫作上最符合學術規範。這反映出訓練上具有一定水平,只是四平八穩

中卻缺乏真正的「靈魂」；也就是說，其研究中所探究的問題價值有限。他緊接著指出了，這樣的情形也可見於台灣諸多傳播學術期刊。世新大學傳播學者沈錦惠⁽¹¹⁾曾就論文如何呈現實證資料，就教其時任教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知名傳播學者 Denis McQuail。McQuail 指出論文模式應無定規，但是論文撰寫宜以創意思考及見地為重，繁瑣的統計過程本就是研究中的必要付出，實不應佔據用來呈現研究者思想、見解的寶貴篇幅；只要原始資料列於附錄，正文中應該只呈現有助於且足以支持論述的數據與資料即可。誠如斯言，論文的格式、內容均應重視思考的架構與創見，不應該以資料的累積與篇幅的多少作為研究者捍衛自己論點的形式藉口；進一步推論，當國內學者都以熟悉的「動機—問題—文獻回顧—方法—分析結果—結論」的論文格式進行書寫時，也許隱而不見、卻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對問題所展現的思考。任教於美國的華裔傳播學者林文剛，也指出了我們應該更關心釐清了什麼問題，它對社會、生態體現什麼價值，而不是因為我們和其它學門使用同樣的概念與理論就覺得心滿意足(林文剛，2000：11)。這些不同的案例，卻都有相同的反思⁽¹²⁾，那就是傳播社群對於好研究的判斷標準的迷惘；也就是在研究品質部分，台灣的學者們對處處都會浮現的研究體驗缺乏正視、檢討、反思，以致於統合整理的過程，這也是本文想要點出的迷思之二。

然而，真正弔詭的是台灣傳播社群的教學，卻有著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正當 1990 年代，美國各地的傳播系、所紛紛被裁併的同時(陳韜文，1999：137)，國內傳播系、所卻不斷成立。政大傳播學院院長翁秀琪在回顧台灣的傳播教育時，便曾提到「1991 年是一個台灣傳播系、所成立相當關鍵的一年...1991 年到 2000 年，每一年都至少有一個傳播系所成立。」(翁秀琪，2001：41)而到了 2002 年，台灣地區的傳播系、所的建制化情形，總共有 26 校 72 所，相較於社會學系全國共 9 校 20 個系、所的情況來說⁽¹³⁾，可以說是蓬勃發展。而根據遠見雜誌的調查，傳播系、所一直是新鮮人的最愛之一，甚至有許多學生進大學之後還想轉入傳播科系⁽¹⁴⁾。這樣的情形突顯出一種情況，那就是傳播學在教學

體質上的生機不斷，這是眾聲喧嘩迷思中易被忽略的真實情形。

教學不斷蓬勃發展的情形，更加凸顯了研究始終不能有效累積此一問題的嚴肅性。若是繼續使用上面關於靈魂的比喻，那種台灣傳播社群的不安，除了靈魂的問題令人苦惱之外，研究與教學之間的步調與發展景況不一，更凸顯了靈魂與身體之間的巨大落差。

靈魂的不安，卻從身體的發展中見出希望的端倪。政治大學傳播學者陳百齡(2001:34-35) 便從教育部歷年統計資料指出，「從 1988 年到 2000 年之間，研究所的數目從 4 所成長為 19 所；另一方面，四年制大學從 9 個暴增為 58 個。...因此，在 1988 年之時，國內傳播學門相關院、系、所、組講師層級以上的專任教師僅有 58 人，但是到了 2000 年之時，則教師數目已經增長至 330 人。」而在培養傳播學術社群新進研究人員的養成管道上，除了已設有十餘年的政大新聞之外，世新傳播所博士班也在 1998 年獲准成立。但是，就在我們學術人力不斷增加的過程中，是否在學術上有著實質的累積，而這樣的累積是否能夠有助於我們對台灣社會中各類傳播現象的瞭解，才是台灣傳播研究者不時應反躬自省的課題。

智慧藏

肆、學術研究與權力：知識能做什麼？

今天傳播系、所的紛紛成立，包括了公立與私立，這反映出與「傳播」相關的產業市場始終存在，且日益蓬勃。而隨著進入二十一世紀，服務業更是產業發展的重心，與之有關的傳播科、系，自是會連帶蓬勃發展。而作為「傳播」學者或是研究者⁽¹⁵⁾，我們得慶幸社會力量提供了這樣的支撐，尤其是市場的蓬勃發展和更多年青學子願意來此領域接受訓練，這就提供了傳播學者們發展自我、及為學科深化而努力的機會。只是建制化的學術機構有兩層含意，一種是和新進者共享本門知識在理解與解決現實問題上的樂趣，二則是提供文憑的認證功能。而後者只是一種形式權力上的作用，前者才與我們研究者必須積極關心的問

題。

傳播研究的前輩陳世敏在〈傳播學入門科目的現實與理想〉的文章中，便以明確的聲音寫道：『大學功能是什麼，儘管意見紛紜，但大學設立九百多年以來的傳統，其功能被定位在「學術研究」已成為主導大學運作的最基本哲學。』（陳世敏，2000:3）學術研究的地位無庸置疑，只是如何看待實務面向的技術卻很關鍵的決定了學術地位的價值⁽¹⁶⁾。本文以為實務不該是理論的對立面與障礙，不該只是學術研究要揚棄的負擔，它更應該是理論深化的重要來源。只是與其說是實務倒不如說是日常生活，才是我們研究者應該魂牽夢繫之處，畢竟有組織且內容豐富的大眾傳播是人類傳播行為的延伸。

而傳播在學術路上走得辛苦的的現實發展，卻與學術研究本土化，以及大學傳播系、所紛紛設置等時空條件，共同成了傳播研究中眾聲喧嘩的具體背景。也就是說，如果學術理論與技術實務是一條線的兩端，那麼目前的傳播研究困境，可以說是最矛盾的體現。因為，系、所不斷地成立，正可以說學術似乎受到重視，但是課程不斷偏向技術實務，又闡明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形紛擾，更何況系、所不斷成立的建制化情形，反而提供了社群成員可以安身立命的位置，只是靈魂的困擾未解決，那麼棲身處始終會是個嘲諷，因為與學術性質有關的焦慮始終存在。在這樣的關係之下，我們實在應該重視實務面對於學術研究的作用與影響，更重要的是實務面與所賴以生存的台灣社會，才是我們學術研究的出發點與回歸處；也就是說，知不知道西方的最新思潮，不該成為唯一學術關注的焦點，因為這樣的思潮也是為解決西方社會或文化處境而發展出來的觀點，而如何與我們自身的社會產生對話，才是目前迫切需要的能力，而藉著思考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我們與西方才有了並駕齊驅的立足點。而對於判斷標準的重新建立，則是本文嘗試釐清的迷思之四。

伍、眾聲喧嘩與單音獨鳴：好研究的再思考

就如同前面的討論，在理論與實務、在國際與本土、在社會與心理，在集體與個人之間，眾聲喧嘩的現象確實存在，只是我們不可忘記由不同力量所引導出來的多元景象，只是一種過渡。以為目前的多元是蓬勃的證據，這便是本文想釐清的迷思之五。多元現象的肯定，常常成為混亂失序的一種合理論述，但也有可能是在井然有序中創造力的醞釀基礎，只不過傳播學界中的多元影響力量確實是眾聲喧嘩的一種特質，更關鍵的則是它等待可以統合雜亂聲音的思想觀點。

再追本溯源，眾聲喧嘩在 Bakhtin 文化理論的討論中，它是用來說明一種存在於人類社會變遷、價值交流與訊息傳播的過程，但這樣的歷程卻是凝聚體現於個別論述中；在內涵上它應該是種展現生動活潑、千姿百態的看法、音調，與語氣的文化特質。簡而言之，眾聲喧嘩所描繪的是個人於再現過程中，對於各類關係與集體力量的察覺以及省思（這當中便體現著對話的過程），而不是團體中各種不同意見個體之間的模式敘述。

這種個人在再現過程中對於集體力量的察覺以及省思，Bakhtin 稱之為自覺意識。此類自覺意識是思考及創意的必要條件，而思考與創意又是解決現實問題的最終憑藉。基本上，自覺意識是來自於個人對其主體的發掘與發現。Bakhtin 在他另一本書《對話的想像》(*The Dialogic Imagination*)中，討論到希臘史詩產生的世界，便曾提到 polyglossia (多元發言、多元語言、多語現象) 與 monoglossia (單音獨鳴) 這一組字詞。他在書中寫道：

多語現象始終存在，它比純粹的單音獨鳴要古老得多。但是，多元語言並不是文學創作的因素，對各種語言有意識的選擇並未成為文學及語言過程的創造泉源。古希臘文對不同語言和不同時代的語言以及不同的方言均有所知覺，不過

創造意識卻只是在封閉和純粹的語言中實踐。(Bakhtin, 1996: 12)

我們因此可以從 Bakhtin 的論點中推論，一旦研究者具有敏銳而強烈的研究自覺意識，也就連帶地強化了對其它主體的覺知能力，如此一來，也才能充分瞭解與認識到研究在社會中的價值、作用與未完成性，也才能摒棄對某一理論的執著與一切故步自封的框架。而這樣的自覺意識，乃是研究者在學習理論、設計方法，與進行研究過程中所應積極培養的。

如果溺水者的自然本能，恰恰趨使他盡其所能地溺死自己；那麼理論與方法是告訴你如何自救的重要的原則，但是反思卻是創造出更多實用智慧的唯一保障。眾聲喧嘩更關鍵的意義，則在於提醒反思時存在著更理想的層次，也因此日常生活中的感覺不是思考的終點，而是起點。由此出發，好研究的結論絕對不是指出眾聲喧嘩而已，而是敢於單音獨鳴，且在其中應表達出對不同眾聲的分析、整理與統合，以致於能使喧嘩的眾聲各安其位，這也就是本文所強調的思想。

陸、眾聲喧嘩之後：倫理向度的思考

當然，不斷的思考與反省並非凸顯過去種種的解釋力不足，只是實踐眾聲喧嘩中易被忽略的隱藏面向。當初以「眾聲喧嘩」字辭翻譯 Bakhtin 觀念、現在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與比較文學研究所的王德威，在他的新書《眾聲喧嘩之後》的序言中便寫著：

眾聲喧嘩「以後」，我們應當回歸基本面，思考喧嘩的倫理向度。我所謂倫理，指的不外是社群中人我交互定義，安頓彼此位置的過程。...倫理因時因地，定義、協商甚至質疑道德、信仰乃是意識型態的內燦特質。但它的前提無他，就是折衝群己、出入眾聲的對話性。它帶來包容妥協，但更

帶來緊張反彈。這樣的眾聲喧嘩倫理毋寧比面的「我有話要說」更具有挑戰性，因為它不僅預留對方立場，並不斷與自我對話。主體的自我投射分裂、主客體間的頻仍互為賓主，使任何的對話不再停留於簡單的說—聽之間。我們學者訴說他人的意見，傾聽自己的心聲，更交代不由自主的雜音。以此類推，人我對話衍生的繁複異同，使我們警醒意義生產過程中，永無休止的交會與錯失。(王德威，2001：20)

此前的理論在當時自有其價值，雖然今日的我們可以輕易地知其侷限，繼而表達出「現在」的「我們」對於「他們」的「我有話要說」。但是誠如新聞學者 Walter Lippmann 在其經典著作《民意》中所曾經表達過的：

如果不是每一代總有些人持續地把成見安排，加以標準化，及改善他們成為邏輯體系，就像一般人所熟知的政治、經濟規律，政治學原則一樣，那麼我們大部分人都要通過雜亂無章的成見來處理（日常）事物(Lippmann, 1956:104)。

過往的「他們」並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容易犯錯的人類的先前版本，而不同意見的「他們」更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不同觀點。如此一來，「眾聲喧嘩」提醒我們的更是一種態度上的尊重與就事論事上的寬容。

當新聞、大眾傳播等傳播的流行形式已經為我們取得社會更多人注意的同時，我們應該站在前輩們的基礎上，重新省思傳播作為一種人類行為的獨特性，發展出一種獨特的解釋觀點，使其可以涵蓋大眾傳播、公共傳播、組織傳播，以致於人際傳播、甚至是內向傳播與語言符號等諸種傳播現象。如此一來，眾多紛雜的主題才有可能在亂中逐步建立起有序的主軸。

而這種在靈魂上可以努力的方向，也再一次召喚我們回到傳統的爭

議之上，亦即如何看待實務與理論的問題，這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基本上，這個亙古的爭議，從新聞系、所成立以來，以致於傳播系、所的蓬勃，人們不斷爭議著定位的問題。美國北達科達大學傳播學教授 Lana F. Rakow 便在一場名為「在十字路口的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的討論中提到了：

以往關於專業的爭議，總是在實務與理論之間，專門過程和入門認識之間、進階的實踐和業餘之間。而這樣的爭議總是將新聞與大眾傳播的實踐視為是產業，也將兩者融合在大學的教育內容之中，因而變成是取得工作的專業養成。……新的論爭則將教育個體的內容焦點，放在彰顯公眾的價值而非為產業提供服務，是對公眾的演說而非商業的說服，是原則而非實踐。(Rakow, 2001:12)

在這樣的關照下，培養慎思明辨能力的目的在於凸顯我們對於群體的責任，而科技的發展也不斷證明了這樣的責任與對於更大社會參與的公民責任。這類與哈伯瑪斯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下所揭示的認識相當接近，而若回到台灣社會中的真實狀況，新聞、傳播畢業生也的確不是都從事相關傳播工作，不過可以肯定的則是他們都會生活在傳播所環繞的社會之中，因此以更寬闊的視野瞭解新聞、傳播工作，繼而培養出能批判思考每天日常生活的傳播行為，以至於社會中的大眾傳播現象的能力，便是傳播教學與研究共同關心的。

也因此，從「公眾」而非「產業」出發，便是應有的共識，而這也進一步從外在上解決了靈魂與身體間兩不相容的落差與隔閡關係。

柒、傳播研究向前走⁽¹⁷⁾

而在亟求解決靈魂焦慮的苦索上，則我們有必要回到傳播研究者個體與社群之上。更具體來說，將學術明確定位於人類豐富整體（包含了

啓蒙運動的理性與浪漫主義中的感性和精神)的彰顯,那麼顯然我們的關懷面是台灣社會,並且可以外推到所有人類組成的社會。

從這樣的視野出發,關心大眾傳播的學術目的就是要探討台灣社會的發展需要什麼樣的傳播媒體,以及從這樣的角度提出更多的問題意識,譬如,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使目前的媒介表現如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傳播媒介有其固定的角色與特質嗎?如果有,今日台灣社會在邁向理想的過程中,存在著什麼樣的落差?我們又該如何改善?美國、英國、德國,甚或是法國、日本,又有何種經驗值得我們參考?而這一情況在不同的媒介類型如電視、廣播、網路等,或不同的媒介再現類型如新聞、相片、廣告上,又存在著何種常態情形與差異?這些源源不絕的好奇與探索,凸顯的是對社會的熱情與學習知識所需的真誠;不斷追尋下去的目的並非權力的滋味,在學術界的我們更期待過程中能提供平日時間壓力急迫的實務面,及平常少有有機會停下來思索為什麼的日常生活能有更多重新跳脫出既有制式軌道的機會,以擁抱更多的知識想像,並為批判思考與人文關懷奠基。

而靈魂極度不安的傳播研究窘境,更需要社群的實踐。一旦落實到實踐面,那麼我們所需的不再是口號,而是更具體的真誠。誠如香港心理學者楊中芳在回顧心理學界的本土化運動,並提出如何深化的反思時所提出的:

當我在擬定本土研究定向的定義時曾下了一番苦心,希望不要引來一些什麼主義,什麼論的爭議...我不希望本土運動成為反「實證主義」及其「權威地位」的運動,更不希望它淪為反「美國學術思潮移植」氣氛下的「歐陸學朝思潮移植」。...我非常同意...「黑貓、白貓」觀點,只要會追老鼠就行,不應歧視什麼概念、什麼方法。但是我在論文一開始已指出,這種自由開放的態度是典型的門面話,說起來很漂亮,做起來效果不彰。其實,我寫此論文的主要目的,也正

是要指出我們不能再唱「自由開放」的高調了，要提出一些具體如何可以深化的方案，在黑貓、白貓中分出有那些特點是比較更能使我們找到會捉老鼠的貓。(楊中芳，1993：229-230)

也許本土化不是傳播研究已經擇定的未來方向，不過這種勇於面對現實問題的真誠，卻是重新找回靈魂的迫切急需。至於眾聲喧嘩，我們實應謹記對話之於成功傳播的價值，尤其是透過真誠以跳脫形式主義的牽絆。諸如此類對於現狀抱持著謹慎反省的態度，也在傳播研究的社群中出現過；早在1996年，傳播學者們便曾指出：

隨著學門蓬勃興起而生的問題，反映在具體的研究環境上，目前各院校以及各科系往往出版各自的期刊，舉辦為數眾多的研討會，多數著眼於特定的議題與領域，學術刊物的流通不夠普遍，研究資料也難有系統累積，更造成研究者疲於奔命於各項研討會，研究成果的交流對話功能相形降低。(王石番、陳世敏、須文蔚，1996:54)

距離至今已有一、六年了，這些情況在學界中依舊。牽絆我們的形式主義，絕非只有一端，它是一種涵蓋性的泛稱，它也會出現在從研究構思、研究執行，以致於研究結果書寫過程中的任何一個環節，甚至是研究者與研究社群本身；而上述關於傳播學界研討會處處的省思只是一例，真誠的態度更期待反省之後能得以落實，繼而讓那種只在乎表象的形式心態得以改變。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歷史學者盧建榮，便曾透過討論二十世紀石刻史料來檢討1935年到1997中國中古史的建構。他指出在學術社群中「欠缺對話，形式上指的不是學者之間沒有來往或溝通，而是交談或溝通的不是虛應故事，就是過度從嚴指摘到吹毛求疵的地步....」(盧建榮，1998:395)。這種忽略學術對千瘡百孔社會的實際作用，反倒是將日常

生活中的權力困擾延伸到了學術的探究，他接著寫道：「同行中缺乏問題意識，或即令有之，由於沒有共同興趣的時代課題，也難形成交鋒的文化。」（盧建榮，1998:396）當然，我們不至於天真地以為權力是可以摒除的，傅科便直接指明「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只是藉由反思，我們至少期待權力被運用得更謹慎、更有品質。

眾聲喧嘩是多義、豐富的紛雜，卻也可以呈現井然的秩序。文學評論者王德威便以一種慎重的多層關照寫道：「眾聲喧嘩是我們書寫與存在的方式，它考驗、刺穿、揶揄我們的對話能力。在一個生機蓬勃的社會裡，人人都學習成爲對話者。」（王德威，2001：22）在這樣的情境下，思考具有在外在環境與內在自我之間不斷辯證探索的特質，而且喧嘩的眾聲一旦成爲缺乏思考的「對話」，它將只會是容許歧異的一種冷漠，長此以往，這樣的冷漠會變爲隔離—真正的隔離。如此一來，學科內部並不會有進步、昇華的力量，只有在眾聲喧嘩之中，謹記那種屬於傳播、屬於社會、屬於文化的公眾(public)身份，繼而不斷從傳播的角度提出對於人與社會、對於諸種不同力量之間的統合的解釋，這種對於思考的強調也才不會使喧嘩流於一種混亂而已，反而能從其他學門處獲得一些有用的反思，我們的傳播社群也因此才会有源源不息的發展動力。

而從 1990 年代開始倡導「研究本土化」的華人心理學界，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不斷地突破既有框架，嘗試摸索更康莊的道路。台灣大學的心理學者黃光國(2001)在討論台灣學術研究水準低落的現象時，便以「核心/邊陲」的區分來解釋邊陲社會文化型態的「原裝設備加工」(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特色；在這樣的背景下，產品的生產是依賴國外的需求，而非國內的需求或技術的創新。也因此，他提出了「文化的反思、典範的重建」做爲自身學術研究工作努力的目標；在其中，文化的反思有兩個面向：一方面，黃光國際鼓勵研究者要回歸中華文化傳統，尤其是對儒家的探索，二方面是要接受自己「非西方社會研究者」的身份，並盡力從方法論、科學哲學的角度掌握「西方文化的精

髓」。這樣的反思標示了在邊陲社會探索學術的艱難（傳播研究當然不是唯一遇到發展瓶頸的學科），而只有把這樣的視野置入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的關照，我們眾聲之間的對話才會有燈塔般的方向指引。

我們往這個方向努力，不一定就會開花結果；但不往這個方向努力，卻一定不會開花結果。「文化的反思，典範的重建」，非西方社會的知識份子瞭解自己的歷史處境之後，除了走上這條道路，還能夠作什麼樣的選擇？（黃光國，2001:24）

向內自省、向外借鏡，十字路口上的傳播研究要怎麼走？是逐步漸進？還是畢其功於一役？甚或是可能重蹈其它學科的覆轍？在相隔數十年之後，我們又到了十字路口，有相同處：繼續為傳播學門的正當性努力；卻也有與以往不同的反省，尤其是處在全球邊陲的我們：是繼續替國際學術界作比較性的案例探討，還是致力於社會自身的對話與文化的昇華？其實這都還屬於未定的戰局，每一個研究者與研究社群都可以有所影響。然而，寬闊的視野與嚴謹的規範，則是「混亂中只有眾聲」與「喧嘩間尋求創意」間的分界點。最後，有必要再予以強調的是真實生活中的各說各話，總讓我們遺忘了應該面對的問題，甚至產生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景象。而 Bakhtin 眾聲喧嘩中重視它覺的自覺意識之提倡，以致於在視野遼闊的對話中覺察並安頓人、我之間的關係，才是本文期待藉由重新回歸台灣社會、回到經典著作所想說明的關鍵論點。

註釋

- (1) 本文中關於 M. M. Bakhtin 的相關討論，請參考王德威(1988, 2001)、錢中文(1998)，以及劉康(1995)等；此外，Bakhtin, M. (1996) 以及由錢中文主編，賈澤林、白春仁等人翻譯的《巴赫金全集》(1998a, 1998b, 1998c)亦是本文主要的引述來源。
- (2) 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1821-1881)，俄國小說家，著有《罪與罰》、《卡拉馬助夫兄弟》，與《地下室手記》等作品。大陸學界多將其譯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文為求前後行文統一，一律將 Dostoevsky 譯為杜斯妥也夫斯基。
- (3) 托爾斯泰 (Leo Nikolaevich Tolstoy, 1828-1910)，俄國小說家，出身貴族，著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人生論》等作品。
- (4) 這兒的可能性，並非指天馬行空式的任意聯想，而是指在特定脈絡下研究者所付出的真實努力，繼而在習以為常的認知中創造出更多可被接受的理解途徑。
- (5) Rantanen, T. (2000) The future of Nordic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rdicom Review*, 2: 37-41.除了本文之外，*Nordicom Review* 這一期尚有其它文章亦處理到相同議題。
- (6) 在 1995 年的 *Communication Theory* 期刊第五集第 2 號，便有名為 "No Respect? The Disciplinarity and Media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的專題，討論傳播研究學科性的內涵及問題，如 Streeter, T. (1995) Introduc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nd against the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2): 117-129.；而早在 1983 與 1993 年，*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便分別有 "Ferment in the Field" 及 "Special Issue: The Future of the Field--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ohesion" 的專題，討論傳播研究領域內的學門性質與路線爭議。

- (7) Cahn, D. and Hanford, J. T (1984) Perspectives 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haviorism, Phenomenology, and an Integrated View, *The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8: 277- 292. ; Chaffee, S, H. and Berger, C. R. (1987) What communication scientists do, in C. Berger and S,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99-122, Newbury Park, CA: Sage.
- (8) 以下諸篇文章曾形成一場意見上的交鋒，請參見 Potter, W. J. Cooper, R. and Dupagne, M. (1993) 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ommunication Theory*, 4:317-335.爾後經過年餘，幾位學者共同針對上篇文章提出不同的想法，而原本的作者也給予回應。可參見 Sparks, C. G. (1995) Comments concerning the claim that mass media research is 'pre-scientific'? A response to Potter, Copper, and Dupagne, *Communication Theory*, 5(3): 273-280. Potter, W. J. Cooper, R. and Dupagne, M. (1993) Is media research pre-scientific? Reply to Spark's Critique, *Communication Theory*, 5(3): 280-285. Sparks, C. G. (1995) A final reply to Potter, Cooper and Dupagne, *Communication Theory*, 5(3): 286- 289.
- (9) 請參見 Swanson, D. L. (1993) Fragmentation, the field, and the fu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61-172.; Rogers, E. M. and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 Deetz, S. A. (1994) Fu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Challenges, the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Contribution, in S. A. Deetz (Ed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7, 565-600.
- (10) 在這場討論中，報告文章分別為四川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人民大學，以及台灣南華大學的研究生所提出。

- (11)沈錦惠(Mary C. H. Shen)，1999年畢業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在 Denis McQuail 的指導下，她完成了博士論文' Current-Affair's Talk shows: Public Communication Revitalized on Television'的撰寫，本論文是討論台灣社會具代表性的 TVBS 談話性節目—2100 全民開講的社會作用與文化意涵。
- (12)類似的論點，亦可見於陳韜文(1999：138)，文章題目為〈傳播教育的知識結構問題：思考分析與實務技術訓練之間的張力〉。基本上，陳文的重點偏向於教學部分，而較少針對本段落所提出的研究。
- (13)傳播系、所的統計數字係參酌翁秀琪(2001)文中第 37 頁，並加上 2001 年 10 月之後所成立的新系所，有宜蘭佛光大學傳播系，及花蓮東華大學民族語言及傳播系，故共有 26 校 72 系所。而社會系、所方面數字，則是直接以「社會學」的關鍵字自行統計於教育部高教司網頁中的資料，計有 9 校 20 個系所。
- (14)請參見 1998 年 6 月 5 日出版之遠見雜誌。
- (15)「作為『傳播』學者或研究者」，是指一般所謂的「傳播研究者」、「傳播學者」，或「傳播學家」；這樣的詞彙意指將人類各種傳播行為當作是研究對象者，包括人際溝通與大眾傳播等。個人以為受市場導向影響，「傳播」一詞也經常被使用，甚至有濫用情形，因此常見有「傳播」之名，卻無「傳播」之實的「傳播」工作者。這種對於概念上的仔細區分，有助於理解本段後面關於權力的討論。
- (16)相關的討論，請參見鄭瑞城(1998：4-6)。本文對於如何理解學術與實務之間的關係，有清楚的討論。另外，陳世敏(2002)在〈列車開走了〉的文章中，討論大學的學術研究是要著重於培養實務人才的「專業」訓練？還是要凸顯通識教育，不以特定對象的專業技術為目的，且將教育目標放在造就公民之上？兩者之間的拉拒決定了傳播研究的命運。陳世敏認為目前台灣社會的傳播實務界仍未意識到得由自己來進行人才訓練的工作，以致於學術界在兩造間的困惑日益明顯。

(17)傳播研究將會不斷變化，只是向前或向後，並不是變化過程中的當事人或參與者會弄清楚的。然而，人之所以與螞蟻、蜜蜂，以至雞、狗的不同，在於人類具備有意識的思考、反省，以及運用象徵符號的能力。這點凸顯了參與者對整個變化過程與所屬群體的責任與任務。也就基於此，我們越來越不能接受讓任何的社會過程在沒有我們的積極干預下繼續運行；只是在 2002 年的現在，我們更有充分的歷史事例提醒自己：參與之必要，謹慎之必要。向前，是個誠摯的小小希望。



參考書目

- 王石番、陳世敏、須文蔚(1996)。《傳播教育課程規劃研究—成果報告》。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王德威(1988)。〈序〉，《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5-6
頁。台北：遠流。
- 王德威(2001)。〈序〉，《眾聲喧嘩之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19-22 頁。
台北：遠流。
- 林文剛(2000)。〈什麼才是華人傳通問題：中華傳媒生態文化史初探〉，
《傳播研究簡訊》，22 期，11-13 頁。
- 翁秀琪(1997)。〈對台灣「傳播學正當性危機」的一些想法〉，《新聞學
研究》，54 集，1-2 頁。台北：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翁秀琪(2001)。〈台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願景〉，《新聞學研究》，69 集，
29-54 頁。台北：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 黃光國(2001)。〈文化的反思 典範的重建〉，《思與言》，39 卷 4 期，1-30
頁。台北：思與言雜誌社。
- 陳世敏、臧國仁(1998)。〈社會學專門領域成就與頻佔：傳播學〉，《傳
播研究簡訊》，16 期，1-3 頁。
- 陳世敏(2000)。〈「傳播基本調查」睡著了〉，《傳播研究簡訊》，22 期，
7-10 頁。
- 陳世敏(2002)。〈列車開走了〉，《傳播研究簡訊》，30 期，1-4 頁。
- 陳百齡(2000)。〈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現況〉，《傳播研究簡訊》，23
期，7-9 頁。
- 陳韜文(1999)。〈傳播教育的知識結構問題：思考分析與實務技術訓練
之間的張力〉，《新聞學研究》，59 集，137-141 頁。
- 楊國樞、文崇一(主編)(1982)。〈序言〉，《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
化》，I—VII 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楊國樞(1993)。〈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
學研究》，第一期，6-88 頁。台北：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
研究室。
- 楊中芳(1993)。〈試論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學研究：兼評現階段之研究成

- 果》，《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一期，224-241 頁。台北：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 鄭瑞城(1998)。〈大學教育與大學傳播教育—觀念的再思考〉，《傳播研究簡訊》，15 期，4-6 頁。
- 盧建榮(1998)。〈欠缺對話的學術社群文化—二十世紀石刻史料與中國中古史的建構(1935-1997)〉，《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335-406 頁。台北：國史館。
- 錢中文(1998)。〈理論是可以長青的一論巴赫金的意義〉，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1-67 頁。石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 劉康(199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
- 蘇鑰機(1995)。〈學術邊陲地區的傳播研究發展—三個中國社會的啓示〉，收錄於臧國仁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39-55 頁。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中心。
- Bakhtin, M. (1996).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Te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khtin, M. M. 賈澤林譯(1998a)。〈論行爲哲學〉，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一卷，3-75 頁。石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 Bakhtin, M. M. 白春仁譯(1998b)。〈多語現象做爲小說話語發展的前提〉，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四卷，127-128 頁。石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 Bakhtin, M. M. (1998c). 〈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 Lippmann, W. (1956).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Rakow, L. F. (2001). Symposium: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Shifting from industries to public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6/3, autumn, pp.11-14.

Thoughts on 'Heterogloss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s

Chun-Hsiang Hsia*

Abstract

Drawing upon insights triggered by Mikhail Bakhtin's idea of 'heteroglossia', this essay provides a reflexive account of the author regarding the role of a researcher as part of Taiwan academia. Central to this concern is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aiwan,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researcher and his/her community. While exploring how Bakhtin's 'heteroglossia' might be understood or misunderstood,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dialogues among individual members, from which the enriching effects on the community can be expected.

Keywords: Taiwan academia, heterogloss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nd community, dialogue

*Chun-Hsiang Hsia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